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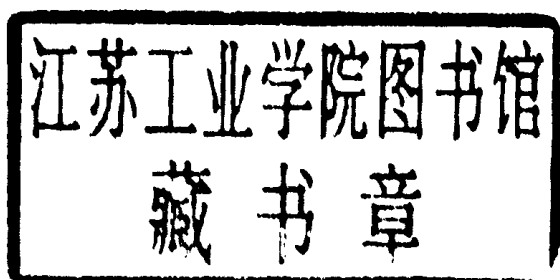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 少数民族

邢安臣 白俊成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

邢安臣 白俊成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少数民族/邢安臣 白俊成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8
ISBN 7-105-02510-7

I. 东… II. ①邢… ②白… III.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关系-少数民族-东北地区-1945~1949 IV. K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83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5 号 邮编 100013)

辽宁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001—500 册 定价: 9.50 元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
ما كنا لنهتدي لولا أن هدانا الله .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1995 - 3 - سَوَّل

如族人民为东北解放建业的
丰功伟绩永为史册：

司马义·艾买提

- 1995年七月廿四

顾 问

郭 峰 赵 石 吴仕民 冯玉忠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铁志	白俊成	邢安臣	许征学
张启祥	刘志超	吴克尧	李玉霞
李晓峰	李清霖	杨久志	金永松
周文富	图 亚	房延禄	钟云亮
郭俊魁	通拉嘎	钱树礼	高玉玺
崔万浩	董文海	韩俊光	阿伊木汗

目 录

代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古族骑兵第二师的成长	赵 石 (1)
浅析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思想.....	李成福 (24)
从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三年看党在东北解放战争 时期的少数民族工作.....	张静芳 (31)
《钢八连公约》是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在少数民族 连队中最集中的体现.....	朱亚铎 (38)
党的民族政策是团结各族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	白俊成 (47)
论辽吉根据地的民族政策.....	范广杰 (57)
论传统民族精神在现代反侵略反压迫斗争中的 作用.....	焦润明 (66)
东北少数民族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	孙锡平 (77)
东北解放战争中少数民族的武装斗争.....	任 杰 (87)
论蒙民武装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王雅文 高文翔 (93)
解放战争时期的阜新蒙民大队.....	柳宝荣 (99)
内蒙古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述略	孙丽美 白雪梅 (109)
概述中共领导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	叶 桢 唐洪森 (116)
解放战争时期东蒙古人民自治运动的性质及 其历史地位	李荣江 庞 森 (126)

内蒙古自治运动中的两条道路及统一

.....	杨 昆	刘志珍	(137)
略谈东北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	唐洪森		(143)
朝鲜族与吉东根据地	黄可嘉	邢邑开	(152)
朝鲜族军民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的贡献	金 星		(159)
解放战争时期新宾县朝鲜族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	金梦顺		(168)
延边朝鲜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革命			
传统精神	宋祥门	吴锦红	(173)
解放战争时期“延边民主大同盟”述评	张春艳		(180)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朝鲜族的“民主联盟”	金元石		(185)
解放战争时期的延边朝鲜族教育	李光林	金铁范	(197)
蓬勃发展的延边朝鲜族文化教育	贾学勤	姚作起	(206)
英勇的金成范模范连	姚作起		(214)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回民支队	初 卓		(220)
简论解放战争时期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民主改革			
.....	荆蕙兰		(226)
为了挽救一个濒临灭绝的民族	韩有峰		(232)
论乌兰夫对解放战争的重要贡献	葛仁钧	周文富	(238)
蒙古族的好干部——王保山			
.....	范景怡	王云鹏	陶玉秀 (245)
青马双枪红司令	郭 华		(253)
朝鲜族农民烈士——蒋炳坤	金梦顺		(258)
东北少数民族及其历史贡献	邢安臣		(260)
后记			(292)

代 序

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古族骑兵第二师的成长

赵 石

(一)

蒙古民族曾是一个强大的英雄民族。早在公元若干世纪之前，内蒙地区即有猗狁，匈奴等少数游牧民的部落聚居。经过长期的繁衍、融合，逐步发展强大。12世纪初，在成吉思汗（铁木真）的领导下，经过数十年的征战，首先统一了内部，接着建立了包括中亚、南俄地区的“蒙古汗国”，其后又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大元帝国的封建贵族统治。但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曾经威震欧亚、统一大部中国版图的大元封建王朝，终于在十四世纪为频繁的农民起义所覆灭。之后其内部在王公贵族统治之下，又处于群雄割据、互相争夺的分裂状态，而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广大人民群众，则依然只能充当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明清两朝对蒙古民族采取封王设旗、分而治之，并以和亲、联姻等怀柔政策，使其纳贡称臣。民国以来，国民党政权依然继承满清统治者的衣钵，通过上层王公、封建头人，实施其大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致使蒙古广大农牧民群众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一条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压迫和蒙古王公贵族结合起来的沉重锁链。因而，反对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外来压迫和蒙古王公贵族内部封建统治，始终是蒙古人民谋求解放的

双重历史任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反国民党依靠王公贵族统治蒙古地区的办法，先是唆使东蒙与德王统治的西蒙脱离，成为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兴安总省。后又废除王公，解放奴隶，实行土地奉上，使蒙区土地名义上为蒙民总有，蒙古族的每个人都有使用之权，实际是为新兴的地主富农开辟了一条霸占、收买、圈占的广阔道路。以扶蒙抑汉、以蒙治蒙的办法，豢养了一批新兴的蒙古族官僚政客，作为地主富农政治上的代理人，实权则握在日本参事官的手中。创办各级蒙古族学校，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蒙族知识分子。成立蒙族军官学校，建立一支蒙古族武装。这一切虽然使蒙古地区原来的阶级关系、社会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在新兴的地主富农统治下，广大农牧民群众仍挣扎在死亡线上。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占领者一方面将蒙古武装牢牢地拴在自己战车上，使其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服务；另一方面在广大的蒙古地区则实行牛、马、粮谷双出荷，使广大的蒙古族农牧民群众进一步陷入无望的绝境。在这种形势面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之下，蒙古人民中的进步力量、包括青年军官在内的广大知识青年一代，渴望民族解放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终于在原苏联红军进军东北的关键时刻，当日本侵略军再次企图把蒙古武装推向反苏前线时，一部份青年军官和青年学生毅然调转枪口，杀死日军官，举行起义。接着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为首的进步人士，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之后，许多青年很快汇集王爷庙，于1945年10月5日，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以王爷庙为中心的蒙古人民解放运动迅速兴起，很快席卷了整个东蒙各地。哲里木盟在阿思根、李鸿范、乌力图等人领导下，首先在科左中旗成立了科左三旗办事处，接着成立了以地区地主自卫武装为主的保安队，以后又成立了以革命青年、军官、国兵为骨干的独立大队，并由中共西满分局提供

了一批武器和弹药。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建议，在王爷庙召开了东蒙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东蒙自治政府。阿思根又以东蒙自治政府内防部（即军事部）部长的身份再次南下，决定在哲里木盟地区组建骑兵第2师，下辖5个骑兵团，依次驻防在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科左前旗、库伦旗、奈曼旗。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和国共继续合作，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蒋介石一面谈判，一面密令向解放区进攻，并在美国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通过现代化的海陆空联运，将其精锐部队投入东北战场，向先进入东北地区，但后续部队因交通运输而滞后，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八路军“收复失地”，这就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以及暂时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与此同时，苏军又根据中苏友好条约，要求我军退出沈阳等城市，准备国民党军队接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我军在远离铁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的艰苦斗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据辽西省委的指示，带领了一个蒙古工作团，由辽西军区所属的保安1旅副旅长李化民带领一个团配合，于1946年1月进入哲里木盟的科左后旗。在那里，不期而遇地见到了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东蒙自治政府军事部长阿思根、南地区行署主席乌力图。在会谈中，工作团首先表示了对东蒙自治政府和阿、乌此行、以及后旗独立中队打击国民党特务包善一的支持。说明了中共中央规定在蒙古地区工作的三条原则：（1）帮助蒙古人民争取自治；（2）发动农牧民群众；（3）不侵犯蒙古族群众的利益。阿、乌也介绍了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情况、以及东蒙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建军、建政的方针。这次到科左后旗，是组织新的后旗政府和蒙古骑

兵2师第6骑兵团。会谈是诚恳、开诚布公的。工作团认为：当前以反对大汉民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方针是对的，但也应看到当时广大农牧民群众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被剥削、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这就有必要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同时，发动群众、清算蒙奸恶霸、改善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活和政治地位。但是考虑到蒙区和汉人地区情况不尽相同，不能照搬汉人地区清算敌伪残余的作法，对蒙古人在伪满时期曾和日本合作的上层人士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表面作官、暗中反对日寇的应当保护；多数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或很少劣迹，应当既往不咎，主要看现在表现；只有对极少数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民愤极大、而且劣迹昭著的蒙奸恶霸，才应发动群众清算。再是自治军必须是一支革命的武装，应当广泛吸收农牧民成份参加，并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革命青年和革命军官手中。地主的武装大团不应原封不动地编入，否则在革命进一步深入、或环境若有变化时会出大乱子。经过反复深入地交谈，对发动群众清算的意见统一了；但在建军问题上，蒙古同志则坚持“蒙古人”三个字就是团结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当蒙古同志同意由工作团派政委，蒙古青年团派政治工作人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前提下，作了“妥协”的处理：旗里原有地主保安武装，部分编入旗大队，部分编入第6团。在发动群众中，另组一支以翻身农牧民为主的新式武装。阿思根部长即根据这一方针，在辽西第五军分区、及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的协助下，在前旗建立了13团，在库伦建立了14团，在奈曼建立了15团。

1946年3月30至4月2日，在承德召开了蒙古东、西部领导人的会议，确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制定了自治运动的统一纲领；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长期分离的状态，取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兴安省政府。3月，西蒙分局

根据阿思根由哲盟返回王爷庙时的建议和同年4月、东蒙自治区后改为兴安省政府的正式委托，决定将哲里木盟委托辽西行署领导，2师委托辽西军区指挥，并决定派2师参谋长王海峰率12团1、3连配合民主联军参加保卫四平战役。4月下旬成立哲里木盟五地委。吕明仁为地委书记，赵石为副书记兼骑兵第2师政治委员，李鸿范为师政治部主任。耿青为2师第5团政治委员、李维涵为政治处主任。敌人进攻郑家屯，根据省委指示，南地区行署和行署主任乌力图及政府机关，由2师11团护送到通辽、中旗西部的舍伯吐。成立了由通辽警备区和骑兵2师组成的联合司令部，乌力图任司令员，高体乾任副司令员，吕明仁任政委，赵石任副政委。6月，成立哲里木盟政府，乌力图任主席，吕明仁任副主席，赵石任政府党组书记。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哲里木盟本部，李鸿范任书记。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哲里木盟分会，李鸿范任主任，赵石任副主任。6月中旬，召开了团队长会议，决定在2师各团全面贯彻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个别调整了团的领导班子。并由盟政府发出指示，在全盟各旗开展发动农牧民群众的清算蒙奸恶霸运动。至此，哲里木盟即完全实现了蒙汉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联合以及工作制度、群众运动、军事指挥的统一领导。

(三)

1946年7月，地委召开旗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吕明仁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决定将我党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转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根据省委的精神，着重批判了干部中抗日战争中实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强调当前整个工作都应以阶级斗争为主。在会上有人提出蒙古和整个中国的革命任务，都有反对外来异族侵略及内部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两个内容，但以何者为主则应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千篇一律地一刀切、绝对化。从全国整体来说，由于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为主，转向以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本统治的、内部阶级斗争为主的任务上来。《五四指示》精神和我党农村的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但就哲盟的具体情况，和整个蒙族地区来说，则由于蒋介石决心打内战，在中国的命运中，又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继续依靠并支持蒙区已经失势的王公贵族重新复辟与卷土重来，哲里木盟和整个蒙古地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武装入侵的局面。因而在蒙区，以反对大汉民族主义武装入侵的民族革命任务，仍然是我党以及蒙古革命人民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方针，而不能和汉人地区一样、一律以阶级斗争为主。但是有些同志则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是蒙古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把蒙古地区与汉人地区割裂开来，实行另外一种政策。并指出当时蒙古上层领导和负责干部，不是伪满时代的官吏就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伪满军官，他们不但不是革命的动力，而且是革命的对象。蒙古革命的主力军——广大蒙族的农牧民群众，则由于历史的原因，仍处于尚未觉醒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在蒙区不但应以阶级斗争为主，而且应以汉人党员干部为主。针对这种意见，持前种意见的同志则认为，革命力量的大小和革命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阵容，并不是抽象的和一成不变的。当前，蒙古革命既然应以民族革命斗争为主，凡是坚持反对国民党大汉民族主义的各个阶层，包括坚持这一方针的过去伪满官吏、军官、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在内，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这样一来，蒙古革命的力量就不是十分弱小，而是十分强大。因而在我党坚持领导和正确的政策引导下，蒙区的工作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主要由蒙古的同志来做。但这种意见都被认为是右倾，并在分歧没有深入讨论、持不同意见同志缺席的情况下，地委作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以

汉人干部为主的《七·卅一决定》。决定中还引用了盟政府提出要在蒙区实行“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住者有其房”的三有口号，这就比《五四指示》要求“耕者有其田”更进了一步。由于这个决定很快即受到西满分局的批评，认为它模糊了当时蒙古革命的性质。地委又于9月10日发出了《关于七·卅一决定的补充决定》。但是由于敌人这时已大举进攻，正常的工作已被打乱，蒙区群众工作已处于停顿状态，补充决定已无实际意义了。

郑家屯是5月底失守的。为了监视郑家屯的敌人，11团及12团分别在中旗的巴彦塔拉与后旗的金宝与敌对峙，其他各团仍分别在科左前旗、库伦、奈曼等地驻防。此中以12团受到压力和威胁最大，因为除郑家屯的敌人外，还有在四平以南地区的蒙奸包善一部的进攻。该团1连在敌人诱降和武力威胁的压力下，连长大地主色旺加布带领全连叛逃。为了巩固蒙古武装，除了前此已将包尔根台的旗大队解除武装，分散编入12团外，赵石又曾两次到后旗进行整编。先是把分散在各努图克的清算武装集中起来，和旗大队并肩战斗。1连叛逃之后，又把清算武装编成12团的新1连、新5连两个连，并撤换了原新庙区大地主、原区长布林得来第2连连长的职务，由革命青年军官祥好任连长。但该连以后却在副连长敖尔布率领下抛开祥好而全部叛逃。库伦的14团也在旗长罗布桑林钦的唆使下，先是1连开始向敌占区靠拢。当赵石与师长那钦双合尔赴库伦处理14团的叛变时，驻在后旗的第13团，在副团长阿拉木苏带领下全部投敌。15团、11团也发生了局部叛变或叛逃。科左中旗旗大队1中队队长苏和巴特，则在叛逃中杀害了大队政委共产党员黎云、大队长朱塔兴阿，并包围了在舍伯吐的群众工作队、盟长乌力图、哲盟革命青年团书记李鸿范。由于驻在通辽的独立旅及时派出部队驰援，他们才幸免于难。当8月下旬，赵石与师长那钦双合尔从库伦返回通辽时，正值郑家屯之敌进攻康平，一分

区和科左后旗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正向通辽撤退。这时又接到 12 团的新 1 连和新 5 连在撤到后旗与通辽交界处忽然哗变的消息，叛军打死了汉人连长孙兰苑，打伤了指导员彭海臣。

新组建的部队在建军初期，当我军战略撤退、敌人大举入侵、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发生部份叛逃，客观上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蒙古地区如此，汉人地区也不例外。但是，一连串叛变如此频繁和严重，则是和某些领导认为“蒙古人”三个字就是团结的力量的右倾思想，一开始组建武装时就不注意质量，以后又未及时认真清理，或清理时不彻底所造成的苦果。至于 12 团新 1 连和新 5 连的叛变，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主要是某些同志在以阶级斗争为主，以汉人党员干部为主“左”的思想指导下，过高地估计了刚刚翻身参军的蒙古族农牧民战士的政治觉悟程度，以及少数汉族党员干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个人作用，而未认识到培养、尊重蒙古族干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性。加上在撤退途中为了巩固部队，又不是首先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耐心地向蒙古干部和战士讲清战争的形势，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撤退的原因，将来革命战争的发展前途，以及我们必然胜利的道路。只是片面强调军事纪律，用禁止“耳语”等办法来控制战士的行为，反而引起蒙古族战士的各种疑虑。结果是战士离家越远，心里越感到前途渺茫，后到蒙汉交界地区、即将进入汉人聚居区的通辽县境时，疑虑更加严重。于是在坏人的煽动下，趁部队集合连长训话时，首先打死、打伤连长和指导员，最后挟持着蒙古族的文化教员叛逃。而 12 团其他连队在谭刚、王海峰同志率领下，特别是和新 1 连、新 5 连一同撤出的吉尔代朗模范队，同样是清算运动中新参加的蒙古族翻身农牧民，同样是汉人党员干部率领，但是由于和战士的思想交流比较正常，也未采取各种严格思想控制的办法，反而都安然无恙地到达了通辽。前两个连队的战士星散回家后，由于都是清算中的积极分子，反而受到当年清算对象和敌人的迫

害，也充分证明了上面的结论。因而当时蒙古武装的叛逃如此普遍，蒙汉干部思想如此沉重，工作损失如此之大，除了敌人高举进攻我军战略转移这一客观形势的影响外，政治上右的和“左”的指导思想，忽视深入地政治工作，才是应当更加深刻认识、吸取的教训。

为了吸取这一教训，当赵石得知由库伦归来的骑兵支队，由后旗撤出的12团从通辽驻地转移开鲁与通辽交界地区时，不顾同志们不应冒险的劝告，立即和警卫员庞海生带了几名蒙古族战士，向老乡们询问了部队离开时方向，连夜跟踪追寻。终于在第三天下午与那钦双合尔师长，与12团的一部分战士和干部见了面，向他们讲清了当时战争形势，我军战略战术，我军必胜的道理，蒙古革命的道路，发动群众搞清算的必要性，以及群众起来之后可能发生的问题。回答了他们提出有关八路军的前途，清算以及果实分配……等有关的问题。对前一段地委“左”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向他们道了歉。告诉他们盟政府和11团已撤到科左中旗的舍伯吐，必要时他们也应向那里集中。当大家谈到八路军战士穿着棉衣，而蒙古部队尚未发放时，向他们解释了是由于供给渠道不同：2师支队军服是各旗负责由盟政府制发，分区武装则由开鲁、通辽两县负责，由通鲁警备区司令部制发。但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赵石又率副官处长鄂文良连夜赶到开鲁找通鲁警备区司令部的供给部，但当时棉衣已发完，布匹棉花已坚壁，临时做也来不及。但是在这时，由于供应渠道不同而发生的矛盾，已经由“技术问题”变成了蒙汉关系的“政治问题”。只好让供给部动员机关干部，打扫库存，集中了几十套棉衣，向开鲁县动员了几辆牛车运回。虽然是杯水车薪，不够分配，但是在思想上解开了“蒙汉待遇上不平等”的疙瘩，使大家认识到八路军不是不管，而是当时确有实际困难。

当赵石由开鲁回到通辽时，敌人进攻通辽的态势已明，我

军决定放弃通辽保开鲁、以便与由康平转移到奈曼的一分区取得联系的方针已定。集中在舍伯吐的盟政府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则议论纷纷。地委决定赵石到那里了解解决。在舍伯吐，为了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赵石和梁一鸣同志一起，重复了向 12 团见面时讲的问题，再次向大家道歉，并承担了“左”的错误责任。在阿思根和东蒙人民自治军一师政委胡秉权同志帮助下，将政府和部队干部及其家属集中起来，由 11 团护送送到科左中旗的老北山。在那里成立了盟政府的北山办事处，由李青龙和达木林任正副主任。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由汉人党员干部徐翔任支部书记，后旗撤出的蒙古干部阿尔斯楞任队长，负责那里的群众工作。由梁一鸣伴同盟长乌力图到开鲁，与原定撤到开鲁的地委与分区机关会合，但因地委、分区已从开鲁撤出，又不知去向而折返。在与地委分区及我军失去联系，又面对敌人政治诱降、武装进攻的形势下，赵石决定同梁一鸣、乌力图、李鸿范、那钦双合尔先由舍伯吐到东部的架玛吐，与中旗旗长色音巴雅尔及他率领的旗大队会合，并与我军主力靠拢，2 师 11、12 两个团则在舍伯吐驻防。途中，赵石草拟了一个我军作战方针、战争形势、将来必胜的宣传提纲，请李鸿范同志译成蒙文，向战士们和群众讲解。

在架玛吐，召开了一个中旗的党支部会，提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掌握大队武装，在李鸿范同志领导下打游击。必要时可撤到北部的国布沁努国克，与已在那里的旗委书记章泽会合，并与附近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又就近与在保康前线指挥的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见了面。邓告知前方很紧，部队都在路东作战，已无暇西顾。

这时舍伯吐已失守，在海力锦与由舍伯吐撤出的 2 师 11、12 团会合。时值隆冬，战士仍着单衣，伤员增加，马掌未钉，弹药将尽，部队情绪极低。当决定向临近的瞻榆县转移时，又有几名战士向连长恳请留下，表示待部队回来时一定归队。在瞻